

邓小平

〔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著
阚思静 季叶译



DENG XIAOPING

解放军出版社

邓小平

DENG XIAOPING

〔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 著

阎思静 季 叶 译



P

88 6 20

邓 小 平

[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 著

阎思静 李 叶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173千字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0

ISBN 7-5065-0475-8/1·65

定价：2.80元

目 录

前 言	(1)
消逝中的帝王统治	(11)
大帝国	(11)
方块文字的力量	(13)
最后的挑战	(16)
历史性的休克	(19)
一个秘密结社	(21)
乱世年代	(23)
一个不平静的省份	(23)
被廉价拍卖的共和国	(24)
四分五裂的国家	(27)
五四运动	(29)
在巴黎的岁月	(32)
勤工俭学	(32)
党的创始人	(37)
油印博士	(39)
警察局留给后世的报告	(41)
从莫斯科到上海	(44)
最薄弱的环节	(44)

在敌后	(99)
初步改革	(102)
在解放战争中	(105)
在延安召开的党代会	(105)
和解的失败	(109)
两种军队 两种素质	(113)
在天安门城楼上	(116)
国家的组织者	(117)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17)
从四川到北京	(119)
暴风骤雨	(122)
第一次裂痕	(124)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人	(127)
1956年论个人崇拜	(130)
“大跃进”的海市蜃楼	(133)
总书记	(133)
幻想奇迹	(138)
军事民主	(140)
从毛主席到刘主席	(142)
两条路线	(145)
彭德怀的信	(145)
困难时期	(149)
猫	(152)

“三家村”	(155)
“阶级斗争天天讲”	(157)
下 台	(160)
江青登场表演	(160)
吴晗——靶子	(163)
政变专家	(164)
工作组	(167)
毛泽东戴上了红袖章	(169)
打桥牌也是罪过	(171)
作囚徒乘专机	(175)
流 放	(176)
奇怪的惩罚	(176)
写在手心上的四个字	(181)
“571工程”	(184)
火 车	(188)
第二次复出	(189)
站在周恩来一边	(189)
邓小平的作风	(194)
四个现代化	(196)
老虎屁股	(199)
被告席上的两个死人	(203)
最后一次讲话	(204)
向周恩来敬献花圈	(207)

清明节	(207)
第三次“下台”	(210)
对老干部的进攻	(214)
逮捕“四人帮”	(216)
真理的标准	(219)
“邓小平问题”	(219)
打圆场	(221)
方 法	(224)
少说空话	(226)
为实践恢复名誉	(228)
三中全会上的转折	(230)
“四人帮”的案子	(233)
华国锋退场	(236)
从现在看过去	(237)
措词的难处	(237)
两万八千字	(242)
唐吉珂德	(244)
闭关自守的代价	(247)
封建主义的残余	(248)
纪念堂	(253)
开 放	(254)
以中国为中心	(254)
冲突的道路	(257)

“三个世界”	(260)
“一国两制”	(264)
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发生变化	(266)
现代化和改革	(270)
四项基本原则	(270)
农村的觉醒	(275)
城市改革	(278)
致富的两种抉择	(282)
各种“老虎”	(283)
道德和文化	(284)
接班人的道路	(287)
被指定的垮了台的接班人	(287)
终身制	(288)
反对特权	(290)
顾 问	(292)
组织制度	(293)
法制和法律秩序	(295)
邓小平之后将是什么情况	(297)
编 后	(302)

前 言

那是1973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7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离奇而又预示着危险的“革命”开始时，他被称作“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重新出来的时候，刘少奇早已成为故人，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几年之后，刘少奇也回到了中国革命英雄们的政治纪念堂，但这只是一种死后的追认和事后的补偿罢了。在不小程度上，正是邓小平坚持要这样来表达对这位受害者的敬意。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孤身只影，缄

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他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旁就坐。这天是1973年4月12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当宴会接近结束时（大概是上第7、第8道菜的时候），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是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当讲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

便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可是，4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的知道，这是一条重要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任务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10年后我重访北京。那时，人们已经知道，邓小平1976年的再次倒台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戏剧性的插曲。其间，这位四川出生的政治家经历了 he 漫长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政策制定人。简而言之，他成了这个国家的领袖。

有人曾经这样写道：邓小平的真正作用始于他69岁时那一次4月举行的宴会。事情自然并非如此，当时开始的事不过是他漫长的人生经历的逻辑性的延续。他的经历早在1966年前就已经使他成了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虽然“文化革命”中被停止的总书记职务，在等级体制中只是第6、第7个位子，但是，在数亿中国人中，或者说在当时1000多万党员中，居于第6位的也决非常人。然而，上述论断也不无一点道理。因为，正是从那时候起，邓小平成了国家生活的中心人物，一条政治路线的突出代表。同他

过去的经历相仿的事，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不少领导人都遇到过。而此后发生的一切却是独一无二，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些在毛泽东之后改造中国的强大力量，以不可抗拒之势，把邓小平推到了政治生活的中心。由于这是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五个核大国之一，由于以邓小平名字为标志的改革方案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都可以使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中汲取教益，由于这一新的政策直接产生在“文化革命”的骇人风暴之后，从一般意义上说，它又为缓和以中国和发达的工业社会相遇为起点的150年文明矛盾提供了机遇，人们来了解这位新阶段最主要的建筑师，无论如何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否有可能呢？迄今为止，邓小平总是不同意在国内发表他的传略。他在1986年9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道：“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指的是例如没有反对“大跃进”等，因此错误中也有他的份。他还说：“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这当然是他个人特有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嘲讽精神。他拒绝为撰写他的传记提供帮助。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他在以对一个人的无限神化为特点的10年之后所作的表态。不过，在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领导人向别人介绍本人情况的做法也是极为少见的。如果有人这样做，那也

不仅是为了满足对情况的渴求，而是出于某种直接的政治考虑。当毛泽东在30年代末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延安向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口述自己生平时，他当然知道，这也是巩固他领导地位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有助于在国民党统治区驳斥把共产党人描绘成“赤匪”的官方宣传。斯诺的报道文学集《红星照耀中国》，确实很快被译成中文出版，许多人正是从这本书中了解了生活在遥远的黄土窑洞里的共产党人的情况，并对他们产生了同情。至于以后，中国自己撰写的关于“伟大舵手”的那些材料介绍，则成了树立个人崇拜的砖砖瓦瓦和权力斗争的组成部分。

同样，当主席夫人江青，1972年向美国作者罗哈娜·维特克叙述个人生平时，她也曾指望一篇在外国发表的传记会提高她在国内的声望，有助于实现个人的无限野心。但是，书籍往往有不同的命运，当维特克的书出现在书店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天晚上已经在北京被逮捕。那时，离开毛泽东的逝世还刚刚一个月，这本书反倒成了批判江青的武器。

华国锋掌权后不久，中国各地到处销售官方出版的吹捧这位新领导人的传略，主要强调“华主席”的无比俭朴和谦逊。但是，他执政没有多久，不管他在前面提到的北京的那个晚上作了多么重大的贡献。今天，他的书已销声匿迹。

关于邓小平，北京至今没有发表过系统的资料。有时

刊登过一些零星片断，例如他80寿辰之际，发表了他女儿的一篇文章，介绍他在“文化革命”期间的苦难遭遇。有时他自己谈及在漫长生涯中的某个插曲。此外，人们还知道与他政治活动有关的那些材料，即他的讲话、活动和表态。但是，人们无从了解，在他还未发表讲话的时候，或者在两次公开活动之间，他在干些什么？

自从邓小平16岁那年参加中国革命活动起，他的名字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不断出现在各个历史性事件的中心。以后又出现在国家建设的重大场合。了解大江河床宽度的人知道，如果航船一旦消失在扬子江河峡的尽头，需要航行多久才能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大致上也只能用这个办法来追溯这代人的命运，探索他们的洪流和事件。

许多人在漫长的征途中倒了下去，也有人背叛了运动。曾经发生过多年的兄弟残杀，在这些斗争中，“革命吞食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成功的人，既要有才华和远见，又要有健康的身体和好运。那些经历了革命全过程的人——其间他们成了掌权的人物，虽然也曾一度失去过权力——把邓小平推上了今天的地位。他们认为，邓小平最明白无误地为当代总结了这段旅程的教训，邓小平积累了最广泛的经验，并且有能力最好地运用这些经验。所以，他们也应该本书故事中的人物。此外，还有蒋介石，他曾企图阻止革命发展，但遭到失败；还有毛泽东，他先是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后又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中期把国家推进了死

胡同。而试图为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安排新的地位的正是邓小平。

今天，学者们几乎还无法开始撰写邓小平的传略，而作为当年在这里工作过的记者却处境不同。我曾经看到过“文化革命”的风暴如何席卷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我又曾经是这个国家大病初愈后逐步康复的见证人。现在应该是理解这个国家的时候了。要做到这点，必须搜集所有公开资料，并且指出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空白点也是全貌的一部分。

这本不完整的和必然是主观的史实记录叙述的是一位政治家，一场革命之路（包括它走过的弯路）和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在开场白里就值得提醒读者注意：鉴于这场革命曾在一个短时期内同我们十分相近，我们许多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不仅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而且在强调自己不同情况的同时走过了自己独特的道路。今天，我们已经以较为冷静的头脑承认了一条令人清醒的经验：仅有共同的最终目标，还不能排除相互间不同的思想概念，不能排除冲突，遗憾的是也不能排除对抗。共同渊源或名称相同的思想意识，不仅可以产生相同的行动，还能引起谁代表“真实信念”和谁是“异端邪说”的严重争论。如果说以邓小平为标志的新领导，今天已经对50年代末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内政方面的不少歪曲作了极妙的批判分析，那么，同苏联10年敌对、争论和不信任的某些“冰岛”即使在两国

关系缓慢的融解过程中还依然存在。因此，国际共运辩论的余波并未消失。如果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回避这一点，事实就会失真，也于益无补。那些以建设社会主义为己任的国家，在经过了一段漫长时期后，又开始在同过去极为不同的基础上相互建立关系。如果不提及这点，人们无法估量已经走过的旅程及其艰辛，也难以评价已经取得的进步。对于那些今天仍是分离和干扰因素的事情来说，这种说法同样有效。

因此，我写的既非天使，也不是魔鬼，我在这里向读者介绍的是政治家，那些过去和今天仍在为人类五分之一人口寻找道路的政治家。他们中间有的人曾经成功地创建了几乎无法完成的事业，但是，当他急于实现一个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时，他失败了。也有人在那震撼天地的梦想破灭之后宣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值得一提的是，这句话正是从前者借用来的，借以唤醒全国），用日常的政治语言说得更通俗一点，这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在中国，过去好多年来把宣扬这一口号当作邓小平的罪状，今天则成了他的功绩。至于笔者，在北京度过的岁月告诉我，说出这样的话，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胆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提倡现实主义的并非邓小平一人，但只有他成功地使大家接受了这一观点。

正因为这样，值得向读者介绍这位政治家的历史，尽